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丛书主编◎周大鸣

Economic Lif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王琛著

漂移的时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丛书主编◎周大鸣

Economic Lif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pace-time Floating: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

漂移的时空

王琛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移的时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王琛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3452 - 0

I. ①漂… II. ①王… III. 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生活状况—
研究—中国 IV. ①D633. 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6945 号

· 中山大学人类学文库 ·

漂移的时空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

著 者 / 王 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责任编辑 / 王 玮 童根兴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岳书云

项目统筹 / 王 绯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19.8

版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字 数 / 334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3452 - 0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研究为国家“211 工程”和“985 工程”
资助课题成果

目 录

导言 寻找新的空间：在现实与历史中	1
语境：人类学里的故事	1
田野：人类学的方法、地点和知识体系	5
人的存在：流动的“空间性”	12
书写：民族志是深描	16
 第一章 凯棠：社区背景	24
自然简况	24
区域人文历史	29
姓氏与聚落	31
凯棠村简介	36
 第二章 流民记忆：从讨饭到找钱	40
逐年而至的旱灾	41
家中无粮脚踏四方	44
寻访生意源头	47
好生意的传播	51
外出生意现状	56
 第三章 阈限时空	61
阈限：三段式过程与二分法	61
扒火车 走天下	65
逾越那道边防线	69

驱赶与收容	73
空间的内外之别	75
 第四章 性别策略：民族文化资本化	80
女性为主的人口流动	81
外出的性别策略	86
都市里的比较	100
 第五章 非正式经济：“好生意”及其衰落	105
好生意浪迹天涯	107
居有“定”所	110
随苗家女人们做生意	112
那叮铃碎响的货郎担	116
源源不断汇到家乡的钱	120
日渐憔悴的生意	123
客位分析：消费主义方兴未艾	127
生意今昔全方位对比	136
 第六章 寄居大都市	138
认识城市空间与规则	140
阴影与角落里的生活	142
晒晒苗家人的水电费	154
城市：想说爱你不容易	156
欲望：谁的都市空间	168
 第七章 残缺性社群	172
身体实践的文化舒适区	173
分享城市经验	180
AA制原则	183
商业性与传统伦理	186

第八章 城里人·少数民族	193
摩擦：文化作为生活方式	195
城市里的坏人	199
面对歧视	205
第九章 离散的心灵	213
现代都市语境中的族群认同	213
花果飘零 两个世界	219
与深圳合个影	226
离散的心灵	230
第十章 苗二代	236
新一代苗家打工者	237
难以跨越的代际流动	244
“未知的孩子”	251
高交会馆外的年轻人	257
第十一章 性别重构 vs. 再度异化	262
“能吃能干才是好媳妇”	263
家庭性别重构	271
传统习俗的动摇	278
女子们的“公共精神”	286
“双重异化”：沉重的肉身	289
第十二章 苗寨的“空间”生产	293
“我们的小上海”	295
思维观念的转变	303
斑驳杂沓的空间	307
新街上的集体策略	310
新街上的“过密化”	313

第十三章 货郎担与疯狂的“苹果”篮子	
.....	318
新街后来的故事	319
山寨机与货郎担	323
仿制、重复：过密化的原因	328
“苹果重新发明了手机”	332
过密化空间与拓展型空间	335
 第十四章 余论：偏心圆型人格与过密心态	
.....	344
传统文化与偏心圆型人格	344
过密化心态	348
 附录	352
 参考文献	363
 后记 行吟的流浪者	384

导言

寻找新的空间： 在现实与历史中

群体认同的景观——民族景观——在世界各地已不再是人类学家所熟悉的研究对象，族群不再具有地域化的、空间上有限的、历史上自省或文化上同质的特征。现在民族志的任务就是揭开神秘的帷幕：在一个全球化、“去地域化”的世界，作为现场经历的地点的性质是什么？

——阿帕杜莱（Appadurai, 1991）

语境：人类学里的故事

在特区深圳，有一群来自贵州的苗族女子，她们身穿民族服装：包头帕、着蓝色斜襟外套、下着黑色百褶裙；扛一副货郎担，上面挂着各种小饰品、小挂件；操一口外人听不懂的苗话，四处游走做小生意。第一次结识她们，我就对这个群体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那是2004年3月的一天^①，远远看到她们一行三四人，包着头、身穿蓝色斜襟衣服——非常跳眼。我一边搭讪一边尾随到了岗厦的一处陋巷。我半是旁观半是参与地加入了她们的老乡聚会。我给她们照相并答应洗出来送给她们，她们很高兴。

看着仪式狂欢中的这群苗家老少女子，我不由得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为什么这是一个女性外出群体？她们是如何走出那遥远封闭的大山来到都市里卖小东西的？她们在都市里怎样生存？面临哪些问题与适应？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族群性很强的民族，她们特殊的民族风俗与城市文明会发生怎样的碰撞？与不同文化背景的都市人交往，会发生哪些文化冲突？又能获得哪些现代性？

在论述“现代性”时，鲍曼连续地反问了若干问题。

难道现代性不是一个从起点就已经开始的“液化”（Liquefaction）的进程吗？难道“溶解液体中的固形物”（Melting the solids），不一直是它的主要的消遣方式和主要成就吗？换言之，从现代性的萌芽时期起，难道它不一直是“流动性”的吗？（鲍曼，2002b：3-4）

鲍曼将“流动性”（Fluidity）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点是准确的。费老曾将传统中国称为“乡土中国”、被土地捆绑的中国，就是因为传统社会是固守的、不流动的（费孝通，1998：6-10）。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是我们社会和个体现代性的肇始。

统计资料显示，庞大的流动大军中，少数民族也占有相当的比重。有的学者通过比较“五普”和以往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认为，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国范围的人口大流动，各地区人口中的民

① 出于专业的敏感，我以前在深圳街头曾注意到她们做生意。这次，我先以买东西为接近她们，并表现出对东西很感兴趣的样子跟着她们一路走到岗厦（位于深圳福田区中部的一处著名的城中村）。从此开始了与这个群体的交往及田野调查。

族成分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增加，各民族人口在地域分布上进一步扩展（周方，2003）。原来主要聚集在西部的少数民族人口，正在往中部、东部扩散，使它的地域分布朝平均、均匀方向变化（沈林等，2001：49）。



图 0-1 岗厦老乡聚会（2004 年 3 月）

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输入地。

1990~2000年的10年间,少数民族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其数量也在不断飙升,所占的比例也由极不显眼的一小部分迅速变成一个显眼的比例。其中上海、江苏、浙江和广东4省市的增幅都在50%以上,尤其是广东省,这10年间,少数民族人口增长了246.19%,差不多翻了两番(蒋荣,2003)。1987~2003年的16年里,广东的少数民族人口从24万发展到135万,增加了111万。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中,有少数民族12个,人口仅372人;1990年增至1.18万,占总人口的0.71%;到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民族成分已达到54个,人口飙升为22.46万人,少数民族占了总人口的3.2%。深圳的少数民族几乎全部是改革开放以后移入的^①。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具有特殊的“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外出务工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又带有“少数民族”这一身份印记。作为流动人口中的亚群体,少数民族在都市里生存状态的群体行为还涉及族群融合、文化冲突、传统代续、民族关系等相对抽象的深层问题(周大鸣等,2004),因而不同于一般的流动人口,不能不另加关注。

进一步来看,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中,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复兴,那么,对于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来说,他们的民族文化能带给他们多大的市场帮助?他们参与市场的文化策略是怎样的?那些苗族女子穿着民族服装是出于传统,还是有利于生意,或者兼而有之?在都市的异文化空间从事经济活动,他们的族群认同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作为一个女性为主的苗族外出群体,她们的外出会给家庭和家乡带来怎样的文化社会变迁?

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都市的生存、适应和族群关系将涉及比一般流动人口更为丰富有趣的内容和面向。

^① 数据资料来自深圳市民宗局。

这群苗族生意人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研究对象。她们来自贵州黔东南偏僻的山区，在深圳也形成了一些散点分布的聚集点。经过我随后去她们家乡的初步摸底调查发现，有外出生意二十多年来，那里也迈出了城市化的步伐——这一切都向我展示了这个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特魅力。

田野：人类学的方法、地点和知识体系

田野工作（Fieldwork）是从事人类学研究的独特方法。马林诺夫斯基（B. K. Malinowski）及其名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后，这种在长期田野工作基础上写作一部民族志（Monograph）并完成某种理论证明，就成为科学的人类学规范。马氏强调研究者与当地共同生活，学习当地语言和文化，采取直接的方法观察，“钻进他们的心灵，听取他们的意见”（马凌诺斯基，1986：17），从而掌握“土著观点”，而非局限于研究者自身的文化、民族中心主义。这是人类学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也是人类学对自己的重要挑战。其伟大在于，不是用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观念和思维框架去裁剪和硬套土著的文化世界，而是透过一种同情心（Empathy）去认知和理解属于土著的意义世界。“同情”作为一种社会行动，不是一种带有“自上而下”意味的怜悯之情，如库利所说，是“交织着想象与差异的社会行动”，“一个人的同情的能力是对他的个性、能力、道德水准及心智状态的衡量”（库利，1989：87），是能使自己处于他人地位、能与他人感情产生共鸣的一种才能。也可以说，它是对外物最真实的感知能力。这构成了人类学方法的独到成功之处——比其他大多数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关于社会生活更为丰富的信息。一旦从某个群体内部来着眼看问题，我们就会更好地理解这些成员缘何如此行事，并可以对同研究中的情况相交织的社会过程了解得更多（吉登斯，2003：821）。

这也使人类学成为一个最富人性、最有人味的学科。

其独特的挑战在于，学者要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中介性地出入于文化内部观点（Emic）和外部分析（Etic），而“这两者达致的途径有时是矛盾的”（郭佩宜等，2007：ii）；世界上没有哪个人不是带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思维图式去认识外界的；根据心理学的“投射效应”，人倾向于将自己的心理投射到外界事物上，因此要做到对“他者”的准确理解并非易事。它需要专业的技术，也需要一些心智品质。所以“田野”也成为每个人类学者的成人礼。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学界对于流动人口的研究，正如周大鸣所说，学者们多用社会调查方法，如问卷调查法、个案访谈法等，明显缺乏“主位研究”，而且问卷和访谈内容雷同较多，且都是学者们从自己的知识背景和城市文明角度来设计的，因而研究出的只是学者眼里的“农民工”，而不是农民工眼里的“农民工”（周大鸣，1998）。之所以强调主位知识和客位知识的差别，不仅因为这更符合社会科学标准，如哈里斯所说的，“唯一限于主位观点或唯一限于客位观点的研究策略，不像那些两种观点都包括的研究策略那样有效地符合目标定向的社会科学的标准”（哈里斯，1989：39）。而且还在于，没有客位就无主位，没有主位也就无所谓客位。虽然主位和客位有时是矛盾的——不抛弃自己文化的预设立场就没有可能正确认识他者的文化，但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相关、互达的，单一位置的知识亦无法真正了解彼此。清楚自己的文化才能意识到他们与我们的不同，而对他者文化的认识反过来又能促进研究者对自己文化的深刻理解。这是因为有了坐标。

与“主位缺失”相联系的，就是从流出地的实际经验出发来对流动人口所作的研究的缺乏。我认为，主位角度和背景地（流出地）的研究对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是尤为重要的。“要了解一个种族，首先一定要了解这个种族过去的身份认同情况……只有了解过去的历史，了解这个种族历史上存在的种族标记，才能真正认识到现在他们是用什么象征符号体现他们的传统特征”

(辛格尔顿, 1984: 50)。由于他们是带有独特文化背景的群体, 不了解他们的原文化就难以理解他们的都市适应、文化碰撞和认同等相关问题。

基于以上认识, 本研究的田野工作就包括了流出地和流入地两个时空背景。在当今这个充满流动性的现代社会环境中, 人类学的田野是开放流动的, 不再是过去的封闭固定。克里弗德 (James Clifford) 曾借用米切尔 (Michel) 《日常生活实践》(1984) 一书中的“空间实践”一词来形容现代人类学者面对的田野: “空间”从不会凭空被给出, 它总是在不经意间被给出并通过身体去实践。从这一观点来看, 没有给定的田野定义, 田野必须在实践当中, 通过参加具体的社会空间和互动旅行才能知晓 (克里弗德, 2005: 190-191)。2004 年到 2005 年的一年中, 我随她们从岗厦到上梅林、到安良、到南山、到陶吓^①以及她们家乡, 我随她们走客, 看她们进货、做生意, 直接观察和参与了发生在她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我的调查是在一种很自然的日常生活情境中进行的。我没有对这个不识字的苗族妇女群体做问卷, 每一次前往我都是根据事先考虑到的调查内容与她们聊天, 并对她们的日常行为进行观察。她们也经常邀我参与她们的活动, 尤其是遇到困难或出现变故的时候, 她们会打电话给我, 这让我捕捉到了许多珍贵的“现场”。

对她们家乡的调查, 第一次是在 2004 年 5 月, 我随她们回家乡插秧。我与她们的友谊得到了家乡男人们的认可与欣赏, 我在当地的调查也因此而得到了尽量满足。在她们家乡, 我调查接触的对象很自然地过渡到了苗家男人。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与入户调查, 最主要的访谈对象是 72 岁的顾怀伦老人、村长顾先庆、

① 这些都是她们在深圳的分布地点, 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叙述到。

顾支书、张会计以及艾宝爸^①等。顾老老^②（顾怀伦）是远近有名的文化人，我住在他家，他待我如同自己的女儿。有趣的是，在我之前有两个来这里做调查的博士都住在他这里。一个是当时留学日本东京大学的杨志强，杨博士做民族文化方面的调查，涉及苗族的历史与认同，后写有相关论文《鸟居龙藏的苗族观——论近代民族的形成过程》。另一个是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留学生严翠恒，她主要做普通话方面的语言调查。通过顾老老，我还认识了在贵州文联工作的著名的苗族学者王惟宁老先生（笔名燕宝），他是凯棠龙塘人。我也向他求教过许多问题。当年7~8月，我再次前往苗乡进行了一次补充调查。前后两次对家乡的调查有1个半月。家乡的调查，涉及社区历史、人文环境、经济、人口、文化、风俗等，重点是人口的外出状况，以及外出带来的社会文化变迁。

2011年2月，我重返苗乡，同行的有台湾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郭良文教授^③，与一个既有知识和经验储备又随和有趣的人一起做田野，受益良多。这次的追踪研究，主要是考察时隔五六年之后的社区新变化。这次搜集的新材料，主要反映在本书的第12、第13章，也会有一些零星散入其他章节。由于存在时间跨度问题，这次书稿修改时，发现某些时间表述以及对她们年龄的描述会给我带来一些纠结。客观的时间，我一定准确描述，力避不规范写法；会斟酌考虑6年前的文本与现在修改的时差，选择合理的表述，不致引起混乱和错误；但涉及年龄，为了使文本及描述的故

① 遵循当地苗家人的称呼习惯，本书大部分访谈对象的名字采用音译的苗名。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和利益，部分人名进行了化名处理。

② 老老，是当地对于男性长者的尊称。

③ 郭教授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 C. L. A.）社会学系博士，澳大利亚南韦尔斯大学（U. N. S. W.）媒体、电影与戏剧系博士。2010年9月至2011年8月受聘为“鹏程学者”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工作一年。郭教授在台湾正在做关于兰屿人的研究以及“兰屿媒体与文化数位典藏”项目。他有着丰富的田野经历和广博的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他有田野激情，他知道了我的田野点之后，很高兴地接受我的邀请。

事停留在彼时的味道（情境）里，我没有修改那些涉及她们年龄的描述——也就是说，没有将她们的年龄按照现在的时间来重新计算、修改。因为年龄（时间）是人的存在属性之一，他那个年龄上做了什么、有什么样的心情，只是有助于我们对其状态的理解，而不以准确的年龄信息为主要目的；如果我按照现在的时间重新计算并改过来，就不是那个时候的“他”了。“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书写亦如是。

其实，从文化所有者的角度去理解他们，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民族志方法的一个局限也恰在于，资料的获取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研究者获得对方信任的技巧。没有建立朋友关系，研究不太容易顺利进行（吉登斯，2003：821）——对方没有可能向你敞开心灵。许多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时都曾遭遇一段艰苦的进入过程。比如格尔茨研究巴厘人是在跟当地人一起逃跑时才得到他们的认可（格尔茨，1999）；巴利的《小泥屋笔记》写尽了田野调查时当地人对他的作弄以及他的苦闷——竟也成就了一部另类民族志（巴利，2003）。

我一开始跟她们接触时，她们非常谨慎防备，毕竟在都市里她们经历了太多的风险，她们以一个封闭的心态和群体来自保；再者，也从没有城里人主动去结交她们。但在清楚我没有恶意并会好心帮她们之后，她们那种自然、热情、开朗的天性就流露出来。这让我相对容易地进入了她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的调查就是在这种交往中自然展开，逐步深入。

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与调查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生活上与被研究者打成一片。除了“同住”（因为她们的住处实在太拥挤了）以外，其他我都力求做到。我和她们一起吃饭、一起喝酒，跟她们去做生意、随她们走客，结识了她们在深圳的相当一部分老乡，并和其中几个年龄相仿的女子结成姐妹般的情谊。

对少数民族进行田野调查，尊重他们的风俗有助于迅速得到他们的认同。比如在和她们吃酒的时候，我观察到她们每个人在